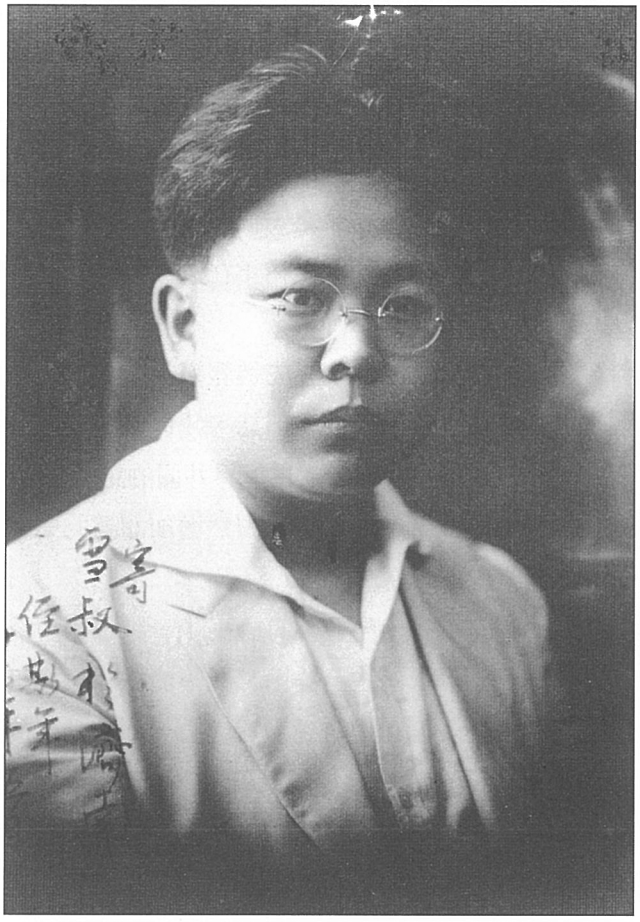
無中生有的志業

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



意氣風發的傅斯年

民國十六年五月的傅斯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和中文、歷史兩系主任數職，正籌備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不久又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奠定不朽的學術志業。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民國十七年(1928)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後三個禮拜，傅斯年致信陳寅恪說：

> 此研究所本是無中生有，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史語所檔案」，元字9號之1，以下簡稱「所檔」）。

前句道出歷史實情，後句反映傅先生創所任事的一貫作風。

傅斯年創立史語所，不論治學的態度、方法、目標和組織，都爲中國二十世紀的學術樹立一個新典範，也替中國爭取到世界性的學術發言權。傅斯年怎麼會想到要辦這麼一個研究所？一般多說他留學德國，深受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響，但他一生只提「蘭克」二、三次，藏書中沒有任何蘭克的著作（王汎森；1997， Wang Fan-shen 1993，p.95），向來的通說恐怕不必然多麼可靠。我對這個問題尚無絕對把握，不過，從他離歐返國前夕的資料來分析，探求當時他主要思索的問題，對這個爭議也許有些啓發。

傅斯年負笈歐洲，首先三年半在倫敦大學，然後轉赴柏林大學又過三年，於十五年(1926)的秋天束裝返回中國。歐洲六年半的遊學生涯，他大部分的時間研讀包括實驗心理學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在內的自然科學，有數學、化學、物理和統計等。傅去國半年多時，寫信給胡適，感嘆北京大學六年「一誤于預科乙部，再誤于文科國文門」（1920.8.1，《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37冊，頁349，以下簡稱《秘信》）。這種心態留歐期間大概沒有大改變，直到十四年(1925)給顧頡剛的信還說自己「不弄史學」（「傅斯年檔案」V:115，以下簡稱「傅檔」；又《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457，以下簡稱《全集》）。他雖然留下不少檔案資料，片紙隻字幾乎巨細靡遺，但我們只知他在柏林大學的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文（參王汎森、杜正勝 1995，頁52-53）。

一個史學圈外人進入史學領域內，可能面對什麼問題？所要挑戰和超越的是什麼對象？對傅斯年來說應該是很具體的，活生生的，而非不痛不癢地移植什麼蘭克史學。三年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會」，我從傅斯年與顧頡剛和胡適的關係，分析他的史學革命，提出「從疑古到重建」的看法（杜正勝 1995），現在續論他所創建的史學革命的基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應從顧頡剛和胡適說起，因爲對這兩人的評論是傅斯年以「不弄史學」之人而終於在史學王國引領風騷的關鍵。

破繭而出的新天地

話要從民國十五年(1926)秋天說起。這年七月下旬，與他睽違將近七年的老師胡適也到歐洲，由英而法，在巴黎研讀敦煌資料。傅斯年自柏林赴巴黎與胡適相會，他知道胡在中國甚忙，難得說上幾句話，這次是最好的機會。八月十八日先從柏林發一長信給胡（《秘信》37冊，頁356-360），九月一日師生巴黎相見，聚談三週。傅的長信談論他的學術觀點，其畢生志業大抵都可在此信追尋根源，但胡適似乎不太能領會；有些需要細述詳申的地方，留待面談，善寫日記的胡適也不能詳記（《手稿本胡適的日記》第五冊，1926.9.2）。該信中傅斯年有些話語狀似消極，譬如說他這幾年「離群索居」，「懶得世上無比，書信、生活一切廢棄，文固不寫，書亦未讀。」他在柏林與「寫中國人之電影打吵，找人，作文，催使館」，但所「與聞的都是沒有登報的價值。」甚至說，「北京師友總以爲我是閉戶讀書，言之可歎。爽信我回國後，作一糟文，大大的 demonstrate 我之不才于朋友，免得長期的擔負這個不能如期之雅望“如芒在背”的苦惱，不亦樂乎！」這一類近似自暴自棄的話，可能在與胡適面談時也有所流露，致令胡適「感覺失望」，認定「孟眞頗頹放，遠不如頡剛之勤」（《手稿本胡適的日記》第五冊，1926.9.5）。

傅斯年與胡適在巴黎分手，從馬賽買棹東返，十月底抵達香港。當時廣州是革命根據地，中山大學採委員制，委員有學者朱家驊（次年改組，任副校長），顯得朝氣蓬勃（胡頌平 1969，頁16-18）。當年十二月傅斯年應聘爲中大教授、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朱家驊 1951），開始他一生轟轟烈烈的學術志業。先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不久說服蔡元培在剛剛籌備的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一連串生龍活虎的作爲，比起十五年八、九月間他給胡適的「頹廢」印象，判若兩人。前後相距不過一年，就有這麼大的轉變，是何緣故？

其實胡適對這位高深莫測的學生這次是失察了。我們沒有他們師生在巴黎暢談的記錄，單就柏林長函而言，雖有上述狀似消極之語，但那是傅斯年一封揭示畢生志業的信，或明或暗地表示他已有別於顧頡剛的路（參杜正勝 1995），我們可以稱做〈與胡信〉，以別於另一封給顧頡剛的長信，後者可以稱做〈與顧信〉（「傅檔」V:115），二者是關係傅斯年史學思想成形的第一手史料，可以互證。

原來傅斯年自十三年（1924）起與顧頡剛書信論學，但信皆未發，所以也沒有顧的回應。及傅在巴黎與胡適暢談後，一時興起，重新抄錄，並且有所修訂，船到香港，共抄了四十紙，才寄給在廈門大學執教的顧頡剛。但原信稿還剩十多張未抄，準備到上海付郵，卻一直未寄出，原稿亦不知下落。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成立後，



傅斯年寫給顧頡剛的長信首頁

顧頡剛受傅斯年之命，編輯《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未經傅的同意，把這封長信分作兩個題目分期發表，即〈評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繫」〉和〈與顧頡剛論古史書〉。承蒙顧潮女士惠寄長函影本（編入「傅檔」V:115），可以校正刊本的一些錯誤，從眉批也可以推定一些觀點形成的時間。然而傅斯年歸國經年，未完信稿雖經顧屢催而始終沒有再整理，這是顧頡剛編按所說：「無奈他不忙便懶，不懶便忙」（《全集》四，頁493）能完全解釋的嗎？

上面說過，信起寫於1924年正月二月間（據傅眉批），先評丁文，第二部分與顧論古史已在一年之後，但都在1926年九月才抄成正本。與顧相關部分，原稿與抄本相隔雖然不到兩年，傅斯年的想法卻發生極大的變化。開頭說，顧頡剛與人論戰，「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論戰。然而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這段起首部分批評李玄伯，李文發表於十三年（1924）年底，傅在柏林能讀到，應該不早於1925年。此時的傅斯年恭維顧頡剛，稱他爲史學之王。然而到重抄舊信時，傅斯年已經變了。不過就傅來說，既已寫過，也公開談過的想法便讓它存在，現在雖然意見不同，繫於舊友之情，仍然把舊信寄出，故說「竊自比于季子挂劍之義」。劍是挂了，不過傅請顧「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傅檔」V:115，頁1）。這些話是1926年重抄時寫的序言，顧頡剛接到信，置序言於不顧，也不論如何理解，秉持「該把自己想到的意思隨時發表」的原則，便在《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發表。但「傅先生見之，終不以爲可」（《古史辨》第二冊下編，頁301，顧頡剛十九年四月編按語）。

所謂時移勢易，當年深悔受乙部之誤，不弄史學的傅斯年回國不久，不但在中山大學創辦一個新研究所，而且又從中大準備移師中央研究院，創建另一個更重要的研究所，豈再是昔日吳下阿蒙乎？兩三年前在顧頡剛「史學上稱王」的氣氛籠罩下的傅斯年，要向北大舊友顯示他的不才的傅斯年就此告別了。最關鍵的是，傅斯年不論在

自己心中，而且在客觀形勢上，已完全超越「顧氏王國」，另有自己的天地了。此一新天地是怎麼形成的？大概在什麼時候？

胡適勸過傅斯年寫文，並以顧頡剛爲例，傅回答說：「頡剛因以寫文而成學」，相對的，「我的懶惰實在救了我兩條命」，一條命是身體的，不似以前之多病，另一條命是精神的，「因懶未曾寫文，免得現在羞得無地自容」（《秘信》37冊，頁360）。

十二年(1923)五月顧頡剛在《努力》增刊《讀書雜誌》第九期，刊登〈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引來劉掞藜、胡堇人等的論辯（《古史辨》第一冊中編）。傅斯年讀到時，據〈與顧信〉，已在次年(1924)，當時有「發憤想寫一大篇參加論戰」的衝動。然而終因困於嵇叔夜的個性，懶與拖，「當時如泉湧的意思」，後來竟「忘到什七八，文章遂做不成。」這些話顯然有言外之意，文章未寫，因此免得現在(1926)自覺羞愧。「現在」爲什麼會覺得「當時」的衝動令人羞愧呢？

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傅斯年「一時大驚大喜」，「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們從〈與顧信〉1925年春以後❶寫的信知道，這時傅斯年佩服顧頡剛對《詩經》的了解超過孔子（「傅檔」V:115，頁15；《全集》四，頁467），又說「客觀的歷史家要從顧頡剛算起」（「傅檔」V:115，頁17；《全集》四，頁470）。他誠心認爲顧佔居中央的位置，「在史學上稱王」。因爲這時傅斯年「不弄史學」，遂多有「光武故人」的情懷。然五、六年來游心於心理學、物理、化學和數學的傅斯年，在留學的最後階段，突然要「弄史學」了，他情願如先前對羅家倫、姚從吾戲言的，向顧頡剛稱臣嗎（「傅檔」V:115，頁9；《全集》四，頁457）？我們知道在他回國前夕，見到顧編的《古史辨》第一冊，「匆匆一翻，沒有細看下去，覺得他不應該就此辨下去，應該一條一條把他辨出來的問題料理去。」他認識到顧頡剛發現的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由此開啓，「可得無數具體的問題，一條一條解決後可收漢學之局，可爲後來材料的考古學立下一個入門的御路，可以成中國 Altertumswissenschaft 之結晶軸」（《秘信》37冊，頁360）。可惜顧頡剛沒有更上一層樓，看樣子也不知該怎樣更上一層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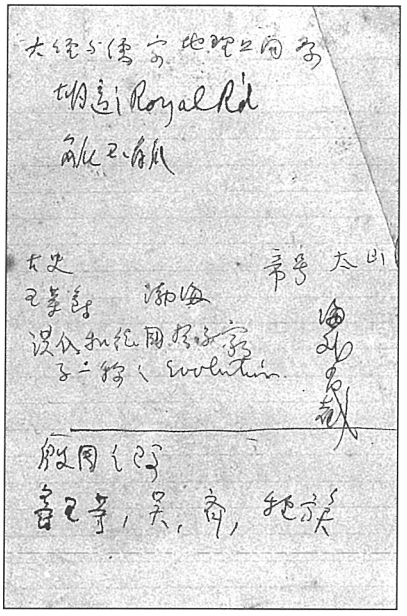
傅斯年顯然想借顧頡剛「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胡適 1924）這把鎖鑰，一一解決今古文之爭所衍生的一切大問題，以「收漢學之局」，做個總清理、總結帳。在這基礎上再用考古學來建立中國的「古代科學」

❶ 傅先生1926年九月自註：「這下一斷（段）是于一九二四年末至一九二五年初所寫」（「傅檔」V:115，頁8）。這裡反對李玄伯說「解決古史的唯一方法是考古學」（李玄伯 1924），李文發表于十三年(1924)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刊的《現代評論》，傳到德國應不早於1925年的春天。大體而言，1924年傅先從《讀書雜誌》陸續讀到顧的疑古新論，向柏林的中國留學生羅家倫、姚從吾等人推崇顧頡剛，及下筆寫這段信時，已到1925年了。

(Altertumswissenschaft)。這種重視考古學與考古材料的態度，後來成爲他一貫的風格，而與稍前稱頌顧頡剛史學稱王時，調侃李玄伯截然不同。那時他認爲這把總鎖鑰不會「爲後來的掘地所掩」，顧頡剛的古史論無待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於顧頡剛的古史論，於是慫恿顧頡剛「還是在寶座上安穩的坐下去，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掘下去」(「傅檔」V:115，頁8；《全集》四，頁456)。大學時代同樣疑古（杜正勝 1995)，也同樣關注今古文學派的傅斯年，一旦決心進入史學領域，如何跳出這個「顧氏王國」的陰影，而走出自己的路，將是考驗他的嚴肅課題，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善用他以前認爲不會構成「顧氏王國」之威脅的考古學。但1926年八月給胡適寫信時，似乎還沒有完整的想法，只說依顧頡剛的方法收拾漢學之局，然後「可爲後來求材料的考古學立下一個入門的御路」，以成中國「古代科學」。

這封長信對他的史學方法說得比較明確的是語言學 (philology)。信中評論胡適的學術成就，認爲小說研究破天荒地「開闢了一條新世界」，至於馳譽士林的中國古代哲學史，既不算空前，也非絕後，不如小說評之具有長久的價值。大學時代就向校長蔡元培提出哲學門（系）之歸屬（《蔡元培文集》卷十，頁468)，又在哲學的故鄉——德國研讀哲學的傅斯年，斷言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方術；而且不論哲學或方術，都是從語言的特質上來的。希臘哲學固從希臘話的特質出來，德國哲學也只是些德國語言的「惡習慣」。傅告訴胡適，「如把後一時期，或別個民族的名詞及方式來解，他不是割離便是添加，故不用任何後一時期，印度的、西洋的名詞和方式。」橫的方面，固不能借用西方的哲學概念來講中國的方術；縱的方面，古代方術與六朝玄宗、隋唐佛學和宋明理學也「斷然不需要同一方法和材料」。傅斯年不像一般人，期望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之後，接著中卷、下卷一直寫下去，他認爲研究古代方術的「用具及設施，大多是言語學及章句批評學」，與研究佛學之需要梵文知識而不需漢學的章句批評學不同，依他自己的斷代，以性（習）之所近，但論古代，不下於南朝。「這些東西百分之九十是言語學及文句批評，故但教追亭林（言語學)、百詩（章句批評）之遺訓，加上些近代科學所付我們的工具而已」(《秘信》37冊，頁357)。傅斯年向胡適提出語言學在研究中國古代方術或思想史的重要地位，就方法而言，已經超越顧頡剛的「史學王國」的疆界了。

方法之外，關於收拾漢學之局的具體問題，傅斯年〈與胡信〉所談的不外《春秋》是否魯史，《春秋》與孔子的關係，《穀梁》是否仿《公羊》，《左氏》如何學《公羊》，《左傳》與《國語》的關係，以及《史記》的問題等等，此外他對〈大學〉、〈中庸〉、〈禮運〉也都有些想法。這些問題〈與顧信〉有更詳細的論述，大概寫於1925-26年間。平心而論，這些問題的視野都還在顧頡剛的範圍內，也沒有超越清末以來今古文之爭；即使按他的理想一一解決了，能不能走出一條「御路」，達到中國的Altertumswissenschaft 的門口，恐怕都有疑問的。



傅斯年自歐洲東返前的筆記簿

但史語所「傅斯年檔案」有一本捕捉靈感的筆記簿（「傅檔」I:433），其中一頁有「胡適之 Royal R'd」之字樣，Royal Road 在倫敦，應是1926年秋他與胡適見面前後思索的隨筆，有的是短論，也有不少零碎片斷的語詞。這些語詞，有的在〈與顧信〉有所討論，詳者如「中庸——二段」的字樣（「傅檔」V:115，頁12-13，《全集》四，頁461-463），略者如〈六經與儒家的地理關係〉（「傅檔」V:115，頁19；《全集》四，頁472）。有的則是全新的概念，如「古史」、「帝號」、「太山」、「旅于太山」、「五等爵」、「渤海」、「海外有截」、「殷周之際」、「爵五等吳齊種族」等，皆超出今古文的老問題。這些思考在歸國後多陸續寫成論文，如〈夷夏東西說〉、〈大東小東說〉、〈周東封與殷遺民〉、〈論所謂五等爵〉、〈姜原〉，構成傅斯年古代史研究的主要部分。另外，「莊子齊物論」，後來寫成〈誰是齊物論的作者〉。「晚周 v. 漢」列有三項子題，「(1) 著書只是by product v. 著書成專業，(2) 能見時代背景 v. 不能，(3) 問題 v. 系統」。民國十六至十七年任教于中山大學所編的講義〈戰國子家敘論〉或發端於此。

傅斯年以這些長短不一的文章攻佔中國古史研究的領域，而且表現鮮明的面貌，和顧頡剛截然區隔。溯其根源，可能多在1926年萌芽滋長，這本筆記是最有力的證據。1925年春到翌年夏秋之間，短短一年多產生如此的巨變，當他給胡適寫的長信說「此時想到的題目至少有三打」時，他的史學天地應該基本成形了。當然，筆記簿所記的詞句或片斷文字不排除有東航途中的思考。傅斯年原先既是疑古派，疑古的顧頡剛所建築的史學王國，對轉變中的傅斯年，像一個繭，這也是向來他自己做的繭。但在東航中，傅斯年破繭而出，在悠悠天地間飛翔。大約四十天的航程，藍天碧海，傅斯年欣賞朝日晚霞和觀星望斗時，古史研究的課目和即將展開的史學革命應該是無時不在腦海中盤旋的吧！六、七年來多病而有點消沈的傅斯年似乎換了一個人，筆記上說：

> 專向 traditional 說挑戰。一反殷周間觀念，以紂爲 hero，志在召前修而增殷民榮譽，故不憚煩。箕子是王夷甫，微子是譙周，周公是多爾袞，太公是王船山心中之賈沖。

顯然比「懷疑」更多深刻雋永的意味了。筆記本又說：

> 若不去動手動腳的幹——我是說發掘和旅行——他不能救他自己的命。

這是他有名的宣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藍本，擺脫故紙堆的束

縛，展現一個新時代知識探索者的新形象。

筆記本還有更重要的，是中國與西方主客易位的態度。〈與胡信〉說，他要做的古代史「但教追亭林（言語學）、百詩（章句批評）之遺訓，加上些近代科學所付我們的工具而已」(《秘信》37冊，頁357)，清儒傳統重而近代科學輕。但筆記的話便不同：

> 我們現在必須把歐洲的歷史作我們的歷史，歐洲的遺傳作我們的遺傳，歐洲的心 術作我們的心術。這個叫做「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就是說，歐洲人有文明，我們負來。假如我們不這樣幹，結果卻也是一個「螟蛉有子，蠃蜾負之」，就是說，我們有土地，歐美人負去。這是鄭康成《解》：「言有國家而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傳檔」I：433)

這樣以近代科學爲重的態度，與一年多後(1928)所作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簡稱〈工作旨趣〉)近，反而與稍前寫給胡適的信遠。

體質厥異的雙胞胎

民國十五年(1926)十月底船到香港，傅斯年應聘爲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中山大學之聘傅斯年，主要是朱家驊的主張。朱比傅只長兩歲，民國六年(1917)朱從德國留學回來，任教於北京大學，傅斯年還是學生，兩人並無接觸，但從沈尹默知道「傅孟眞這個人才氣非凡」(朱家驊 1951)。翌年朱家驊赴瑞士專攻地質學，1920年轉柏林大學，1922年通過博士論文，次年六月傅斯年雖從倫敦轉到柏林，但朱家驊已獲博士學位而赴其他國家遊歷，年底雖返柏林短暫停留，他們似乎亦未見面。朱家驊再返北大，後以反對段祺瑞，十五年六月南走廣州中山大學。十月初，國民黨發表戴傳賢爲中大委員長，朱任委員而總理實際校務(參據胡頌平 1969)。從朱家驊的行歷來看，聘傅斯年當在他抵達香港以後的事。也就是說，當九月下旬傅自馬賽啓碇東航時，他的前途依然茫茫。

據朱家驊追憶，聘請傅斯年擔任院長兼兩系主任，十六年(1927)春一到任，馬上全力以赴，延聘有名教授，而自任功課亦甚多(朱家驊 1951)。延聘的教授包括顧頡剛、董作賓、羅常培、丁山等人，皆與他的志業有關；也在講課過程中更有系統地整理他的史學思想。然而和他的畢生志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最有直接關係的，是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單從研究所的名稱來看，就知道這兩個機構是傅斯年史學思想孵育出來的雙胞胎，時間相差幾個月，不過由於外緣因素不同，這對雙胞胎的體質卻有極大的差異。

十六年八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創立，傅斯年兼任所長；十一月發行該所《週刊》，顧頡剛擔任主編。《週刊》發刊詞執筆爲誰，頗有異說。當時也執教於該校

的董作賓，雖返鄉省親，未與其事，但後來追述此事，從內容推測，斷定「必是孟眞的手筆」（董作賓 1951）。顧潮編著的《顧頡剛年譜》則歸屬於她的父親顧頡剛（頁144）。承顧女士惠示原始資料「頡剛日程」，民國16年10月21日欄有云：「作研究所週刊發刊詞」，其著作權屬應很清楚，執筆人是誰也證據確鑿。唯該發刊詞所體現的學術方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衆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不能說顧頡剛不可能有，但把語言歷史學提出來當做該研究所的綱領，卻非歸屬傅斯年專利不可。發刊詞且認定這兩門學問

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目的、同手段；

治學態度上宣示

沒有功利的成見，知道一切學問不都是致用的；

治學方法則要

承受現代所究所問的最適當方法。

這些絕對是「傅斯年式」的，不是顧頡剛的蹤影。我們知道不及一年，傅、顧齟齬，以致於分裂，治學態度之分歧是一大因素。主張普及和致用的顧頡剛這時寫下上述的宣示，顯然是替傅斯年說話，可能因爲傅是所長，秉其意思作文。所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週刊》發刊詞的著作權不能如實地按「頡剛日程」所記的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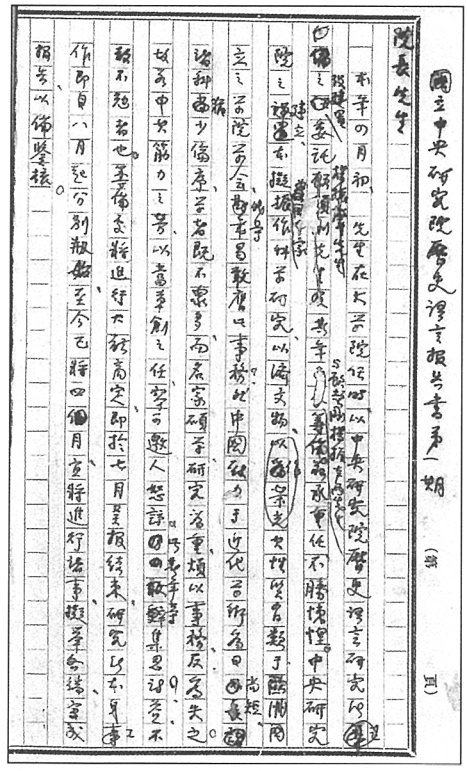
十六年七月中山大學取消委員制，以戴傳賢爲校長，朱家驊爲副校長。誠如傅斯年給胡適的信所說：「中大不是毫無問題，在校外實有不少政治力量」（17.4.2，《秘信》37冊，頁364），唯倚靠戴阻擋於外，朱經營於內，傅斯年這批人還能在這夾縫中創造小小的學術新天地。不過戴傳賢並不太穩，這年的下半年曾兩度被迫離校，第二次朱也一起離開。據顧頡剛給胡適的信透露，「此間政變後，孟眞急于脫離」（16.12.5，《秘信》42冊，頁345）。學校高層人事起起伏伏，一般情形，正如傅斯年給胡適的信所透露的，「一群敗類，如邵元沖、謝瀛洲、高元、翟俊千（三人皆所謂競社中堅）❷等，下了非做校長不可之決心，於是甚麼手段都用了，結果他們自抹了一鼻灰」（17.4.2，《秘信》37冊，頁364-365）。雖然校內奪權失敗，在地派與外來者的隔閡則一直存在，傅斯年埋怨「此間野蠻人士不解不諒」，顧頡剛、楊振聲諸人「均不覺廣州之可久居，頡剛望北京以求狐死首丘，金甫居廣州而如烏孫遠嫁」（同上，頁370-371）。這批外地教授雖然名滿天下，但在廣州中大直如「託身異國」（傅斯年語），語言歷史研究所同人的心情可見其一斑。

然而就在傅斯年到中山大學任教的這年，中國政局丕變，國民革命軍北伐相當順利，學術條件與以前大不相同。十六年四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五月議設中央研究院，十一月通過「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確定中央研究院爲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並舉蔡元培爲院長，下設地質調查所、理化實業研究所、社會科學

❷原函夾註。

研究所、心理學研究所和觀象台，聘請的籌備委員，歷史學有胡適，屬於社會科學研究所；考古學、人類學有李濟，屬地質調查所；傅斯年則歸屬於心理學研究所（《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報告》第一冊，民國十七年度，頁45、416-420）。當時既無歷史學、語言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所，更無「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嗅覺很敏銳的人，憑著北大時代與蔡元培校長的關係，「組織條例」一披露，他很快地在十七年正月到上海，說服蔡元培，「借用在廣州之語言歷史研究所所已成就及將建設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語言歷史研究所」。蔡元培立刻贊成，並「囑照一切原定計畫如樣進行」（17.1.28，傅斯年給蔡元培的信，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史資料初稿》（一），頁8，4-7，以下簡稱《所史資料稿》）。按照這辦法，其實是一個研究所掛兩面牌子。傅斯年返回廣州後，立刻覺得與中山大學這麼密切結合不妥，因此馬上再給蔡元培一個報告，改爲合作關係，中央研究院的語言歷史所雖暫時借用中大的房舍圖書等設備，人員也有重疊，但經費、課題都要獨立，圖書的收集也要自己展開（同上，頁9-15）。蔡元培也同意，於是在三月底聘傅斯年、顧頡剛和楊振聲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常務籌備員。「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名遂在十七年六月第一次院務會議出現，可以說是「無中生有」的一個機構，其催生者即是傅斯年；此時傅猶任中大語言歷史所所長，胡適乃戲稱他「狡兔二窟」（《秘信》37冊，頁371）。



傅斯年親筆草擬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期報告書序言部分

史語所的設置可以說是完全出於院長蔡元培對傅斯年的信任，關於這個研究所籌設的構想、意義和目標，蔡是不甚了了的。稍後傅斯年寫信請胡適代向蔡元培要求寬列史語所經費說：

「蔡先生此時實不大瞭然我們這個研究所所處的地位」❸（18.6.30，《秘信》37冊，頁

❸ 此信年份可能在十九年。信開頭說「莫干山之遊熱死」，提到同遊有任鴻雋（叔永），是斷年的主要線索，但皆不可考。信云：「這個研究所若干不滿我們自己意思的地方，但創辦的時候總不免 Trial and Error。」又說：他因主張近代學問是工場的，不能零星做，「這兩年爲此『搆閔既多，受侮不少』，然屢思去之，而仍不能不努力下去者，以爲此時一散，至少在五年之內，在如此意義下的（事業的、人的）一個集合是不可望的了。」傅斯年主張「集眾」研究大概不晚於辦中大的語言歷史所，所以「這兩年」應包含十七年六月以後的時間。按十七年十月六日傅斯年致馮友蘭、羅家倫和楊振聲的信說：「北平未去，實不敢去也。怕的自己未組織好，辛辛苦苦的爲人吞了也。如果是皆工作的，不把些不相干的大大小小滿安著，奉送之不暇，何用此怕，此實爲事業怕耳」（《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頁520）。此或即「搆閔」之一，涉及他與顧頡剛的分裂，他之有不幹的念頭，也當在十八年年初以前。

409）。從十七年八月蔡爲《集刊》所撰「隔靴搔癢」的發刊辭來看，傅斯年的抱怨和擔心是有來由的。傅斯年要如何讓蔡元培以及總幹事楊銓明瞭史語所的地位及設所的意義？五月間作的〈工作旨趣〉，以及十一月寫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報告書第一期〉（「所檔」元字198號之1），目的都在爲史語所定位，找尋意義，並且說明存在的價值。而新的人事佈局，要爭取的學者，亦要能符合並且實現傅的史學思想。他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塑造形象，灌注有別於中山大學語言歷史所的生命。這兩個研究所的名稱雖然相似，起初甚至雷同，又是同一人創辦，然而精神卻截然差異。籠統地說，一個是土派，一個是洋派，可以說是不同體質的雙胞胎。

史語所的常務籌備員雖有三人，其實只是傅一人而已；楊振聲不久到清華任教❹，顧頡剛也不參與（參顧潮 1993，頁152）。對外，傅斯年聯繫、奔波；對內，事必躬親，主持一切。我們從〈報告書第一期〉原稿刪改之痕跡可以體會當時，至少在傅斯年心目中，籌備只他一人而已。原稿最先寫作「委託顧頡剛先生及斯年」，寫到這裡發現漏了楊振聲（因爲楊已去清華），於是在「顧頡剛」的旁邊加楊，接著寫「三人籌備」。但覺得不妥，遂把顧、楊之名字和「三人」刪掉，改爲「委託斯年與顧頡剛、楊振聲兩先生籌備。」這樣是比較符合實情的，但傅與顧的微妙關係也暴露無遺。顧有自己的想法，也想管事，然而與傅的觀念相去頗遠，據他晚年1973年七月補記的日記云：「孟眞乃以家長作風凌我，……予性本倔強，不能受其壓服，於是遂與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誼臻於破滅」（顧潮 1993，頁152）。他們兩人在民國二年進入北大預科，十五年後即民國十七年，也是籌備史語所不久，交誼之破裂就表面化了。

傅、顧學術方向的歧異

十五年的友情而一朝絕裂，可能有個性因素，可能也有「瑜亮情結」。一年後，十八年八月，顧頡剛給胡適的信有很詳細的剖白（18.8.20，《秘信》42冊，頁361-380），不過，更重要的恐怕是兩人對學術發展方向的歧異。傅斯年辦史語所，倡導科學方法，力求專精，以提升中國的學術品質，〈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甚至揚言近代學術只是少數或個人的事。他說：

> 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即是什麼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這一行的學術（傅斯年 1928a）。

❹ 上註2所引十七年十月六日傅斯年的信，可證楊振聲（金甫）已在清華。此函《羅家倫先生文存》的編者定在十八年，誤。信中談到要聘李濟爲考古組主任，李接此職在十七年十二月，故當定在十七年。

歷史語言研究所不做推廣教育，〈史語所報告書第一期〉向蔡元培建議，做爲國立學術機關，首要任務應

> 輔助從事，且已從事純粹客觀史學及語學之企業，

以及

> 輔助能事純粹客觀史學及語學之人（「所檔」元字198號之1）。

因爲是「純粹客觀」的，故如〈工作旨趣〉所言，

> 這個反正沒有一般的用處，自然用不著去引誘別人也好這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時免不了致人於無用，且愛好的主觀過於我們的人進來時，帶進了些烏煙瘴氣，又怎麼辦？

〈工作旨趣〉作於十七年五月，然而同年三月，顧頡剛爲中山大學《民俗》所作的發刊辭不但提倡研究全民衆的歷史，而且呼籲

> 我們要站在民眾的立場上來認識民眾，
>
> 我們自己就是民眾，應該各各體驗自己的生活。（顧頡剛 1928）

傅斯年與顧頡剛學術發展方向之相左已極顯然，十八年八月顧給胡適的長信埋怨傅壓抑《民俗叢書》，他說，叢書「出到一、二冊時，孟眞就說這本無聊，那本淺薄，出到三、四冊，〔伍〕叔儻就請校長成立一個出版審查會來限制，出到七、八冊時，戴校長就辭掉〔鍾〕敬文」（《秘信》42冊，頁365）。傅斯年認爲「大學出書應當是積年研究的結果」，顧頡剛「以爲這句話在治世說是對的，在亂世說是不對；在一種學問根基打好的時候說是對的，在初提倡的時候說是不對的」（同上）。其實傅斯年創立史語所就是要提倡一種有深度的新學問，他的辦法是以少數人朝「極高明」的層次努力做去，而不是慢慢地、普及地打根基。但顧頡剛則說：「現在的人，救世不遑，那有人能積年的研究。」若依傅斯年的標準，「現在講不到出版，我們不出版，一班可以繼續我們工作的青年便得不到誘掖引導的力量，而要到別的方面去了」（同上，頁366）。對傅來說，出版必需專精，專精不一定都要積年。誠如上述，傅不要漫無限制地「誘掖」青年；雖然如此，他並非不知道「歷史語言學在中國發達命脈所繫」在青年，故史語所肇建時，所關注的兩項基本工作之一是，「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所檔」元字198號之1），而絕不引誘主觀而烏煙瘴氣的人。在史語所籌備期間，這兩位常務籌備員對學術應以精深爲務，還是推廣爲先，便產生這麼大的歧異；思想既已分道揚鑣，勢必無法共事，其他因個性或日常言語、行爲所產生的誤解遂愈結愈深。

傅斯年辦史語所，何以那麼重視高品質的研究？顧頡剛晚年補記日記，對於他們的分歧有所解釋。他說：「傅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故其旨在提高」（顧潮 1993，頁152）。這是實情。上文提到十七年四月傅斯年遊說胡適到中山大學講學的那封信，向胡報告史語所業已籌備，是爲「實現理想之奮鬥，爲中國而

豪外國，必黽勉匍匐以赴之」(《秘信》37冊，頁371)。傅斯年從歐洲回來時，他的學術境界既然自許超越了顧頡剛，則傳統學術更不足數；他心目中只有一個目標要克服，要超越，那就是歐洲的「漢學」，時時刻刻思考「爲中國而豪外國」。他的認識和決心恐怕也給他帶來相當大的壓力，這在《集刊》創刊宣言的〈工作旨趣〉以及〈所務記載〉皆流露無遺。〈工作旨趣〉說：

> 中國境內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是最多的，歐洲人求之尚難得，我們卻生看他毀壞亡失。我們著實不滿這個狀態，著實不服氣。就是物質的原料以外，即便學問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

上引筆記簿所謂另一種「螟蛉有子，蠃蜾負之」，我們有土地，歐美人負去(「傅檔」I：433)，即同一心情。〈所務記載〉講到藏、緬、暹羅、太(傣)等西南語的調查研究，也同樣表現那種「著實不滿」和「著實不服氣」的焦急，故說：「若果印度支那語系的一行學問也被歐洲人佔了先去，乃眞是中國人的絕大恥辱啊！」(傅斯年1928b)

顧頡剛不反對「欲與外人爭勝」，晚年辯解他所不同意於傅斯年者，在爭勝之道。顧認爲

> 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積疊無數資料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須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將學識淺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礎(顧潮1993，頁152)。

「高深」是否必需經過「普及」，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至少對「急躁」而「自信」(借顧氏語，《秘信》42冊，頁367)的傅斯年，一定覺得緩不濟急。至於積疊資料，加以整理，是否就能與外人爭勝，這問題傅斯年是思考過的。在顧頡剛疑古的基礎上，他既已走出一條路，遙見一個中國「古代科學」的天地(見前文)，當然不會以顧的方法爲滿足。他的基本策略是上引筆記簿所記的「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徹底學歐洲漢學家的長處。正如〈工作旨趣〉所說：「現在中國希望製造一個新將來，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歐美的物質文明，即以物質以外的東西也應該取精神於未衰敗的外國。」這樣才有與外人爭勝的指望，所以傅斯年這時的心情和清末革新派「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態度是一致的。表面上雖向外人學習，內心裡則把西方的漢學家當做主要對手。難怪十八年春間，顧頡剛準備接燕京大學聘書，傅斯年大大反對，罵他「忘恩負義」(《秘信》42冊，頁368)，恐怕多少有點民族情緒在作怪。

史語所是傅斯年籌畫出來的，顧頡剛雖與他在中大同事，後來也同任籌備員，但十六年十二月顧給胡適的信還問，報載胡在大學院辦歷史研究所，有沒有辦好的希望(16.12.5，《秘信》42冊，頁346)。這時傅斯年大概得知大學院院長是蔡元培，正準備到上海、南京遊說蔡成立史語所。十七年三月顧給胡適的信又說：「最好北伐成

功，中央研究院的語言歷史研究所搬到北京，由先生和我經管其事，孟眞則在廣州設一研究分所，南北相呼應」（17.3.26，《秘信》42冊，頁353-354）。他對傅斯年的規畫似乎一無概念，對胡適在傅斯年的新學術中的地位也相當模糊。

上面說過十七年正月、二月間，傅斯年前後向蔡元培陳述兩個方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與中山大學語言歷史所的關係雖有轉變，但當時史語所主要的人員基本上還是中大的班底，除聘請中大俄國教授民族學家史祿國 (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 外，基本上都是沒有出過國門的本土學者，如文籍校訂組的顧頡剛，漢語組的羅常培，民間文藝組的董作賓，漢字組的余永梁和丁山（王汎森、杜正勝 1995，頁65）。這樣的人力恐難以師外人之長技以與外人爭勝。所以在五月，傅斯年以三位常務籌備員名義給蔡元培和楊銓的報告就規畫了擬聘名單，包括胡適、陳垣、陳寅恪、趙元任、兪大維、李濟、劉復、馮友蘭、李宗侗、徐炳昶和羅家倫等，除陳垣外，都是留洋的學者。到這年年底，確定加入史語所這個團隊從事「集衆工作」的主要人物，有哈佛大學畢業的趙元任與李濟，巴黎大學畢業的劉復，和遊學哈佛與柏林兩大學的陳寅恪。這四人中，趙元任、陳寅恪和劉復皆於十七年九月二十日同發聘書（「所檔」元字130號之8b、9b、6b）。李濟當年赴歐洲，十二月返國，至廣州，會晤傅斯年，馬上決定轉任史語所（「所檔」元字25號之3；李光謨 1997，頁41）。這四位是當時中國新派學者的代表，分別在語言、歷史、民間文藝和人類學、考古學等方面具有最先進的方法，最傑出的成就，以及最深厚的潛力。除劉復是北大教授外，他們都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任教，所以傅斯年擘劃的史語所，其成員結構從十七年正月依賴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爲班底，到當年歲暮，變成以清華研究院爲主體，就其體質而言，是從「本土派」變成「西洋派」。傅、陳、趙、李構成史語所的核心，顧頡剛排除在外。

舊域維新的史語所

這時傅斯年三十三歲，李濟與他同庚，陳寅恪三十八歲，趙元任三十七歲。這個新研究所是一群壯年學者所組成的學術團隊，它給中國學術界帶來的衝擊不只是年輕有銳氣而已。傅斯年撰寫〈工作旨趣〉，揭示他的目標、方法，發掘新問題，搜集新材料，使用新工具，要把歷史學和語言學做得像自然科學那樣客觀和精確，使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能在中國建立起來（傅斯年 1928a）。作此文時還在中山大學的氛圍下，大概沒預料到能那麼順利轉移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班底。九月發出趙、陳等人的聘書，十一月撰寫史語所第一期工作報告，傅斯年向蔡元培論述史語所設置之意義云：

> 中央研究院設置之意義本爲發達近代科學，非爲提倡所謂固有學術，故如以歷史語言之學承固有之遺訓，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觀念，以成與各自然科學同列之事業，

> 即不應于中央研究院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使之與天文、地質、物理、化學同倫。今　先生在院中設置此所，正是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此雖舊域，其命維新（「所檔」元字198號之1）。

歷史語言之學不能只秉承顧亭林、閻百詩的遺訓，即使他們代表中國傳統治學方法最先進的境界，還要本諸自然科學的求知態度，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此一舊領域才可能產生新生命。新生命的根源端繫於

> 材料與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念與時推進。……此項旨趣，約而言之，即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申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同上）。

傅斯年對學術的基本看法應獲得清華研究院趙、陳、李諸君的認同，否則以清華的聲譽和他們在各自領域的地位，不可能齊集到傅斯年的麾下來，而史語所的新團隊也不可能這麼順利地組成。

同時傅斯年替院長擬致研究員聘書，禮遇之餘，還激勵共同任務的擔戴。〈聘書稿〉云：

> 我國歷史語言之學本至發達，考訂文籍，校核史料，固爲前修之弘業；分析古音，辯章方言，又爲樸學之專詣。當時成績宜爲百餘年前歐洲學者所深羨而引以爲病未能者。不幸不能與時俱進，坐看歐人爲其學者擴充材料，擴充工具，成今日之巨麗。我國則以故步自封而退縮于後，可深惜也。現在中央研究院有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非取抱殘守缺、發揮其所謂國學，實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異之材料，借自然科學付與之工具而從事之，以期新知識之獲得。材料不限國別，方術不擇地域；既以追前賢成學之盛，亦以分異國造詣之隆（「所檔」元字130號之1）。

在這種意念下，凡欲聘而且應聘者都是同志了。

所同何志？十七年傅的報告書說，「爲發達近代科學，非爲提倡固有學術。」此即〈工作旨趣〉兩點反對中的第一點，反對「國故」這個觀念。

「國故」即「國故學」，簡稱「國學」，根據胡適的定義，是指研究中國一切過去



傅斯年代蔡元培擬禮聘研究員之聘書稿

的文化和歷史的學問（胡適 1923）。胡適全面說明整理國故的方法，雖然晚到民國十二年北大之創刊《國學季刊》，但早在民國八年他已對學生毛子水的意見發表評論了（胡適 1919）。當時胡與在《新潮》撰文的毛子水，以及編者傅斯年的按語有頗大的差別，毛與傅都想把中國固有的材料放在「世界的」學術中衡量（毛子水 1919）。在傅斯年心目中，「整理國故」和「輸入新知」是對立的，「不曾中國文先生毒的人」不能整理國故（《秘信》37冊，頁349），則所謂「國故」的地位亦思過半矣。胡適卻教訓毛子水，他的名言是：「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雖然無可厚非，回到當時的情境，未免有些「國粹家」敝帚自珍的氣味。三、四年後，以胡適爲首的北大學者，他們雖然不滿過去三百年「昌明」的古學研究範圍太狹窄，要予以擴大，但所擴大者，不過取消經學做爲主人的地位，提升子史脫離丫頭的角色而已。所謂用歷史眼光給「國粹」、「國渣」平等的地位，就算「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麼？」（借〈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語）胡適等人的宣言雖然想擴大研究範圍，但中國學者的學問卻始終在中國的範圍內打轉。

然而自己已經摸索出門徑的傅斯年便不同，他在〈工作旨趣〉斬釘截鐵地說：

> 學問斷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不過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

上引代擬〈聘書稿〉更積極地表明：「材料不限國別，方術不擇地域。」顯然的，傅斯年心目中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不限於研究中國的歷史語言而已，「如果我們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國的，這並不是由於我們專要研究『國』的東西，乃是因爲在中國的材料到我們手中方便些。」就近比較方便得到的材料，最後還是要與「世界上無論那一種歷史學或那一種語言學」一般，「用同一的方法」來研究，才能進入世界學術殿堂。胡適在《國學季刊》的宣言雖然提到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由外國的啓示來解答中國的問題；然而「國故」是主，新學是僕，態勢至爲明顯。因此傅斯年批評說，不論用什麼科學方法研究所謂「國故」的國學，頂多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而已（以上參〈工作旨趣〉）。

傅斯年反對「國故」還有更深一層意義，他說：「西洋人造了支那學『新諾邏輯』一個名，本是和埃及脫邏輯、亞西里亞邏輯同等看的」，中國人若也如此看，豈不是成爲一種死學問了嗎？現在他要「取所謂國學的大題目在語言學或歷史學的範圍中而論」，如同周之舊邦，維新其生命。方法是「擴充材料」和「擴充工具」，但這擴充和北大《國學季刊》的擴充不可同日而語，按照傅斯年的方法，「勢必至於弄到不國了，不故了，或且不國不故了。」他反對「國故」、「國學」或「中國學」等概念，因爲在他看來，「這層並不是名詞的爭執，實在是精神的差異之表顯」（以上參〈工作旨趣〉）。他要把中國的材料變成普世性 (universal) 的學問，因爲凡夠得上「學問」的就應該是普世的，不能以國別爲斷。這是傅斯年和胡適的區別，也是《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和《國學季刊》的區別。

雖然格於慣性和傳統，史語所只能從中國的材料研究起，但按照傅斯年的規畫，第二步從洛陽一帶起，「將來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就脫了純中國材料之範圍了。」於是想在洛陽，或西安、敦煌，或吐魯番、疏勒設幾個工作站，他相信「有志者事竟成」。當時史語所在廣州，也希望數年以後能在廣州發達南洋學，他說：「南洋學應該是中國人的學問」（參〈工作旨趣〉）。這時清華的陳寅恪和李濟等人都具有超出國界的眼光和實證研究的能力，所謂「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不以中國爲限。雖然民國二十二年 (1933) 以後陳寅恪轉而專注於「禹域以內」，但李濟的歐亞太平洋的思考卻終生不移易（參杜正勝 1998）。在超越「國故」的見解上，他們與傅斯年是志同道合的。

「元和新腳」結合的基礎

上引顧頡剛晚年說傅斯年「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正道出傅的心情，唯其所欲爭勝者，不限於法國而已。帶有這種心情，或抱負，或壓力的人，不止傅斯年，陳寅恪、李濟也都非常明顯，他們的言詞往往激切悲憤，可以說，這是史語所創立時的共同心態。

在傅斯年的心目中，中國的學術園地是荒廢的，材料雖然不少，但是「靠西洋人的腿，卻不一定是他們的腦袋」，「自己的原料讓別人製造」，更談不上能製造別人的原料，像亞洲內陸中西文化交流等課題，「西洋的東方學者之拿手好戲，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幹的，中國人目前只好拱手謝之而已」（〈工作旨趣〉）。上文徵引過傅斯年在十七年寫的〈所務記載〉，呼籲研究印度支那語系，以免使歐洲人佔先，那才是「中國人的絕大恥辱。」他對中西的學術競賽是很在意的，民國十八年❺給陳垣寫了一封非常客氣的信，剖析他的心情，信稿云：

> 斯年留旅歐洲之時，睹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並漢地之歷史言語材料亦爲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所檔」元字109號之1）。

大概也在此時或稍後，傅斯年向李盛鐸的兒子李少微求購珍藏之史料，也說：

> 此日爲此學問，欲對歐洲、日本人而有加，瞻吾國前修而不慚，必于材料有所增益，方法有所改革，然後可以後來居上（「所檔」元字69號之3）。

那麼他辦史語所的目的就如〈工作旨趣〉所宣示的，「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含蓄地說，就如〈聘書稿〉所云「以分異國造詣之隆」，骨子裡其實是企圖「後來居上」，替中國人出一口氣！

❺本函原稿未署年月，唯云：「去年一月斯年行旅京滬，與蔡孑民先生談及國立中央研究院宜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之意。孑民先生久有此願，樂觀其成，即託斯年籌備。」故知此函作於十八年，但月份尚無法考。

這種民族情緒陳寅恪毫不遜色。陳催促傅籌錢購買李盛鐸手中的內閣大庫檔案，以免被燕京、哈佛捷足先登，他說：

> 若此項檔案歸於一外國教會之手，國史之責託於洋人，以舊式感情言之，國之恥也（「所檔」元字4號之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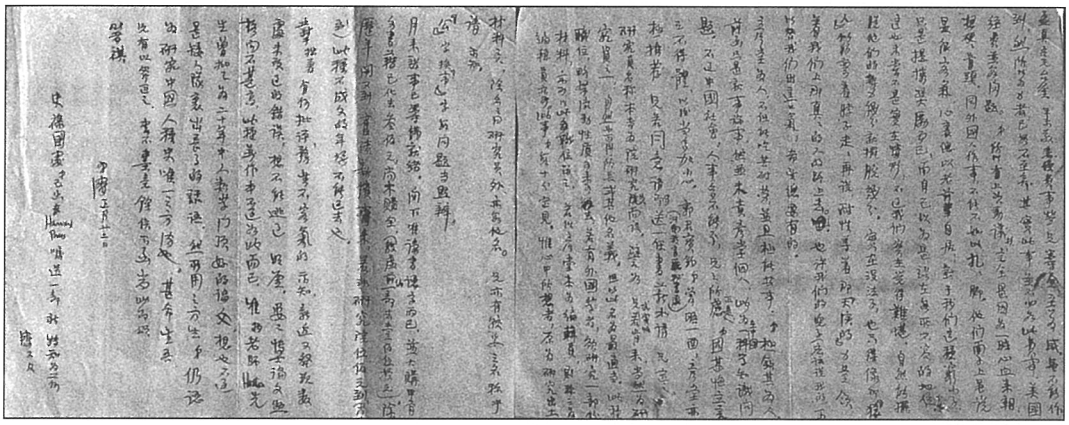
稍早，陳寅恪要求傅斯年設法買下商務印書館的孤本《經論藏》，好爲「中國留一版本」（原作「本版」）（《秘信》37冊，頁381、389），也帶有類似的心情。陳寅恪的個性素傲，但十八年對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生卻吟誦出這般激切的詩句：

> 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
> 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陳寅恪詩集》頁18）

年輕人成群到日本研究漢學，令爲人師者羞愧不已，陳寅恪對中國學術失望悲觀，似乎只有寄望下一代才有可能與外人爭勝。

傅、陳、李三人，唯李濟與外國人共事經驗最多，感受也最深。李濟在十二年(1923)回國，十四年開始與佛利爾藝術館 (Freer Gallery) 的畢士博 (C. W. Bishop) 合作，包括有名的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十七年底轉任史語所後，雙方合作關係依然持續（李光謨 1997，頁36-41）。發掘安陽，斯密蘇利恩研究所 (Smithonian Institute) 資助中央研究院經費，李濟建議研究院宜出津貼（17.12.20，「所檔」元字25號之3）。他向傅斯年傾吐心聲，說明建言的心路歷程：

> 完全是因爲一時心血來朝（潮），想硬硬骨頭，同外國人作事不能不如此扎扎腳。他們面子上雖說是很客氣，心裡總以老前輩自居；對于我們這種窮小子只是提攜獎勵而已，而自己以爲是站在無所不容的地位。這也未嘗不是實在情形，不過我們實在覺得難堪。自然，能擺脫他們的勢力幾分就擺脫幾分，實在沒法子，也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彎著脖子走走再說，耐性等著那「天演的」力量領著我們上那眞眞的人的路上去。也許我們的兒子（應該說我的）可以替我們出這口氣，希望總要有的（18.1.23，「所檔」元字25號之10）。



李濟致傅斯年書，訴說對外國人的心情

李濟和陳寅恪一樣，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

史語所創所核心都是學貫中西之士，對中國傳統學術的困境，以及西方近代學術的優點瞭如指掌，雖然帶有濃厚的民族情緒，但絕不「阿Q」，絕不坐井觀天或孤芳自賞（參杜正勝 1998），他們採取的學術策略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並且按自己的標準，評鑑地結交朋友。十七年 (1928) 五月傅斯年擬聘的外國通信員有法國的伯希和 (Paul Pelliot)、德國的米勒 (F. W. K. M ller)，和瑞典的珂羅倔倫（高本漢，Bernard Karlgren），美國的勞佛 (Bethord Laufer) 也在考慮中（王汎森、杜正勝 1995，頁65；《所史資料稿》（一），頁22）。勞佛終於未聘，米勒不久去世(1930)，伯希和和高本漢延續到抗戰前夕。有人建議聘請弗朗克(Otto Franke)，陳寅恪反對說：「據其研究中國史之成績言，則疑將以此影響外界誤會吾輩學術趨向及標準」(「所檔」元字4號之35）。

上面說過傅斯年的「不服氣」和「不滿」(〈工作旨趣〉)，李濟後來追憶說，這種情緒「在當時的學術界已有很長的歷史，等到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後，傅孟眞先生才把握這一機會，把那時普遍存在學術界的『不滿的意』與『不服的氣』導入正規」（李濟 1951；1967，頁73）。史語所創所諸同仁對西方先進的學術絕不色厲而內荏，歐洲人來把中國的材料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李濟問：「亂烘烘的中國能夠拒絕這些學問上的訪問麼？」而且從學術傳統來看，「他們所注意的資料，大半都是我們自己所忽視的。無論照什麼標準說，我們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對別人來檢取我們自己所毀棄的資料」（同上）。此即傅斯年「螟蛉蜾蠃」論所引鄭康成的話「有國家而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傅檔」I：433）之意。史語所第一代先賢雖不免於民族情緒，但與當時以及後來強調中國文化本位的學者根本差別即在此。

傅斯年創立的史語所既要「發達我國所能歐洲人所不能者，同時亦須竭力設法將歐洲所能我國人今尙未能者亦能之」(《所史資料稿》（一），頁18）。最終目的是要「後來居上」，勝過西方漢學家。凡能達此目的之學者，皆在傅斯年聘請之列。陳寅恪、趙元任早已是傅斯年留學時期的舊識，但他與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的李濟則毫無淵源。傅斯年注意到李濟，是一篇反駁史祿國的文章 “The Bones of Sincheng”（〈新鄭的骨〉，收入李光謨 1994）。史祿國 (S. M. Shirokogoroff) 來華應聘爲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成立，被聘爲研究員，他在中國人類學界的角色或可比擬於考古學界的安特生 (J. G. Andersson)。十七年十月傅斯年給清華大學的馮友蘭、羅家倫和楊振聲三位友人寫信說：「李仲揆盛稱李濟之，我見其駁史祿國文，實在甚好。我想請他擔任我們研究所的考古一組主任，如他興趣在人類學，亦好」(《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頁524）。這時傅看出李濟兼具有「我所能而歐洲人所不能，和歐洲人所能而亦能之」的本事。李的史學觀點與傅非常接近（杜正勝 1998），但在加入團隊之前，他對西方人的複雜心情，傅斯年當然還不清楚。從現在保存的檔案分析，史

語所創所四巨頭中，學術觀點和發展策略與傅斯年最契合者，恐怕要推李濟。

這就涉及陳寅恪的問題。傅斯年與陳寅恪在柏林大學相處有兩年之久（一九二三年夏至一九二五年夏），對陳的學問極其推崇，這是大家素聞的。唯大概十六年(1927)六、七月間，陳寅恪所作〈寄傅斯年〉詩，今之學者頗有不同的理解，這不僅關係兩人的交情，也涉及對當時學術界的認識。詩云：

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
正始遺音眞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
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
解識玉璫緘札意，梅花亭畔弔朝雲。（《陳寅恪詩集》頁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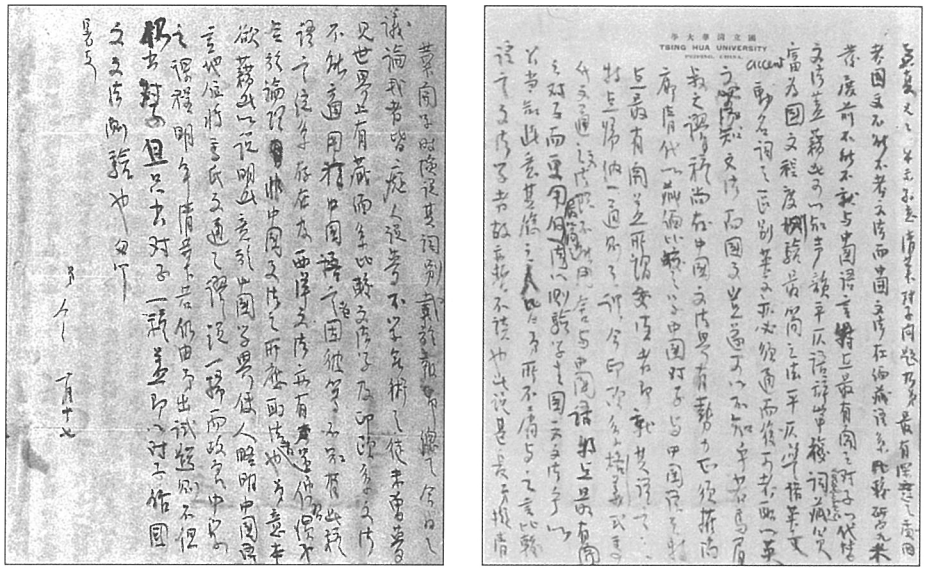
詩既然是寄給在廣州的傅斯年，所謂「北海南溟」之對當視傅爲可以共昏夕、話餘暉的對象。「正始遺音」指五月投水的王國維，「元和新腳」應是包含他自己在內的青壯學者。比較有異說的是「天下英雄」一句，陳寅恪是在表示「其立場與傅有別」（余英時 1997）呢？還是兩人互相欣賞，「唯使君與操耳」？陳詩迂曲隱約，素稱難解，但我比較傾向後一解釋。這時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尚未正式成立，「未成軍」者不一定就指這個傅斯年正在籌思的研究所，唯從上文論述語言歷史研究所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轉變，和從中山大學本土派學者到清華大學西洋派學者的更替來看，即使史語所或包括清華國學研究院陳、趙、李三君，「元和新腳」，中國學術界的新陣營的確尚未成軍。

雖然後來陳寅恪的史學方向與傅斯年不盡同調，但民國十六年的陳寅恪就開始呈現跡象了嗎？我們從胡適秘藏書信知道陳寅恪請傅設法留住商務的《經論藏》當在此時❻（《秘信》37冊，頁389）。我們也知道十七年史語所一開始籌備，他很快答應傅加入這個「元和新腳」的新陣營，與趙元任、劉半農同接第一批聘書，並推薦陳垣擔任敦煌組主任（「所檔」元字4號之4），又積極購買內閣大庫檔案（「所檔」元字4號之1、2）。我們又知道直到二十二年，他發表的論文幾乎全部都是關於「殊族之文，塞外之史」（陳寅恪 1942），都是與西方漢學家角勝的課題。如果我們說一年後的史語所成爲陳寅恪的「元和新腳」也不爲過吧。十八年陳寅恪給北大史學系畢業生的贈言所云「田巴魯仲兩無成」，魯仲如果是影射胡適「整理國故」派（余英時 1997），與上文分析傅斯年反對「國故」正是同調，而非異曲。至於田巴是否指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史學家？傅斯年一向「憎惡馬克思主義」（37.4.28給趙元任的信，「傅檔」III:195），但贈詩時這派尚無像樣的著作，即使所謂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之作——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亦尚未出版，而且傅斯年並不把這本書看在眼裡，他重視郭的

❻ 傅爲此事與胡適寫過兩次信，一署十月十一日（《秘信》37冊，頁381），一無月日（同上，頁389），但用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箋，而且信中提到十月一日就要開學，問胡適所檢定的外國教員人選可有能教本科者，此信當十月一日以前，可能在十六年的八、九月間。十月十一日那封也當在十六年。

是《兩周金文辭大系》，陳寅恪似乎不會把尚未成形的「左派」與胡適等量齊觀吧？

根據檔案，晚到二十一年清華國文試題對子風波之後，陳仍然視傅爲知己之人。大學入學考試，陳寅恪出國文試題，以「孫行者」求對，頗遭物議，遂給傅寫信說：



陳寅恪致傅斯年書，因清華入學考試的對子風波討論中國語文之特性，以傅為其知音

> 清華對子問題乃最深意之處，因考國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國文法在緬藏語系比較研究未發展前，不能不就與中國語言特點最有關之對子以代替文法。蓋藉此可以知聲韻、平仄、語辭單複詞 (vocabulary) 藏貧富，爲國文程度測驗最簡之法。……若馬眉叔之謬種尚在中國文法界有勢力，正須摧陷廓清，代以藏緬比較之學。中國對子與中國語之特點最有關，蓋所謂文法者即就其語言之特點歸納一通則之謂，今印歐系格義式《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舍與中國語特點最有關之對子而更何最簡之法以測驗學生國文文法乎？以公當知此意，其餘之人皆弟所不屑與之言比較語言文法學者，故亦暫不談也（「所檔」元字4號之24）。

此信結尾問候語作「暑安」，日期署七月十七日，蓋風波發生時抒憤之信。「北海南溟對夕曛」，以及「天下英雄唯使君」的確解，應該是這裡所說傅斯年「知此意」，其餘諸人陳寅恪皆不屑與之言。如果早在十六年陳寅恪就諷刺傅斯年獨稱英雄，要劃清界線，史語所恐怕無法成軍，至少孤傲的陳寅恪是不會加入的。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史語所這支研究隊伍是「志同道合」的組合，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治學風格上的標準是新學術，與老一輩的「舊學」或「國故」嚴格區別。史料的觀點固然如此（參王汎森 1997），其他諸如工具、方法、心態亦然。十七年十一月撰寫的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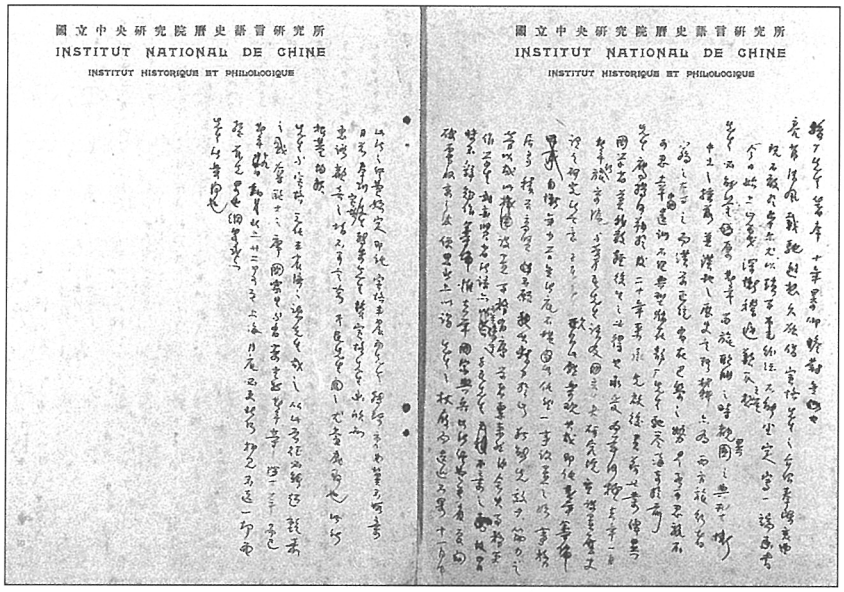
一期報告書，傅對蔡元培揭舉新材料、新工具與新觀念的目標後，接著說：

> 故當確定旨趣，以爲新向（「新」，印刷本總報告作「祈」），以當工作之徑，以吸引同好之人，以敬謝與此項客觀的史學、語學不同趣者（「所檔」元字198號之1）。

同志便吸引，不同志便謝絕，此亦「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

李濟便是一個例子。數十年後夏鼐記述考古組主任產生的經過說，「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學教授，另一位是年輕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掘經驗的歸國留學生。蔡元培院長選擇後者，後來證明這選擇是明智的」（夏鼐 1979）。金石學教授指馬衡，年輕學者指李濟。夏鼐雖在史語所工作過，唯其生也晚，對創所的歷史並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語所成立時的運作，成員不是院長選的，故多想像之詞。史語所設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學術，不是要找聞名的老教授來裝點門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濟給傅斯年的信談董作賓第一次安陽發掘，提到「北大馬叔平曾間接表示欲參加此事」，探問傅的可否（17.12.20，「所檔」元字25號之3）。可見史語所一成立，馬衡就想加入。過了快一年，馬衡同時寫信給傅斯年、李濟與董作賓，正式提出參加考古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絕，李濟向傅報告他與董作賓商酌過，完全贊同傅的決定。他說：「彥堂已擬一極客氣信致馬叔平，弟亦將客氣的回覆他」（「所檔」元字152號之3）。這無關乎人事傾軋，而是對知識的態度和追求知識之方法的歧異；如果說是門戶，那也是「道」不同的緣故。

學問有新舊，人有老幼，但二者並無必然關連。傅斯年拒絕前輩學者馬衡（時年四十七）於千里之外，卻對另一前輩陳垣（時年四十八）歡迎之唯恐不及。十七年六月陳寅恪向傅推薦聘陳垣來所研究敦煌資料（「所檔」元字198號之1），十一月傅斯年問陳寅恪敦煌組事有沒有接洽（17.11.14，「所檔」元字9號之1），陳回信云「昨前兩日連發函電，諒先達賢，援庵先生函附上」（「所檔」元字4號之4）。陳垣可能有來所之意（原函未見），故傅撰第一期報告書中便說敦煌材料研究組由陳垣主持（「所檔」元字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 NATIONAL DE CHINE
INSTITUT HISTORIQUE ET PHILOLOGIQUE

傅斯年致陳垣書，對陳備極推崇。

198號之1）。不久，便寫了那封我所見過的傅斯年最客氣的信，以陳垣與王國維相比，稱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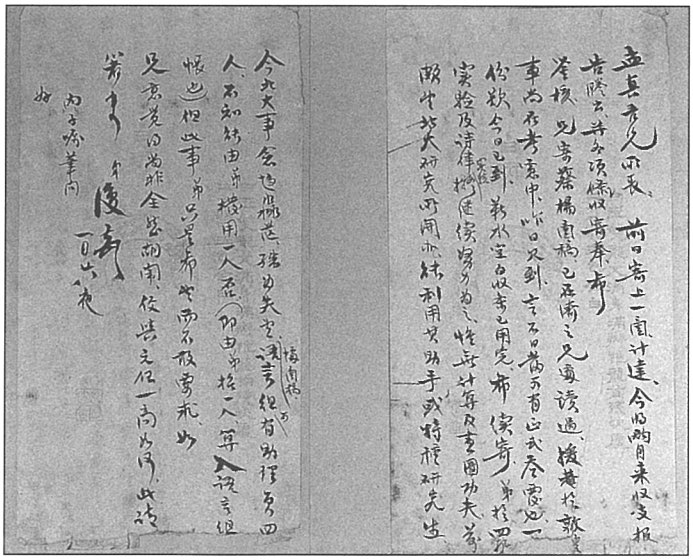
> 靜庵先生馳譽海東於前，先生鷹揚河朔於後，二十年來承先啓後，負荷世業，俾異國學者莫我敢輕，後生之世得其承受，爲幸何極！（「所檔」元字109號之1）

傅斯年與陳寅恪那麼竭誠歡迎陳垣，就是因爲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學術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預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問題，「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陳寅恪 1920）。陳垣和史語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績斐然，可以讓歐洲和日本學者不敢輕視中國無人，故引爲同道。

陳垣和史語所創所諸賢同樣有上面說過的那種難以言宣的民族鬱悶，十八年五月在燕京大學現代文化班演講「中國史料急待整理」，就說：「我們若是自己不來整理，恐怕不久，燒又燒不成，而外人卻越俎代庖來替我們整理了，那才是我們的大恥辱呢！」（陳垣 1929）兩年後他爲日本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傳記的中譯本作序，感慨那珂翻譯蒙古文史籍，開啓日本學界研究蒙文的風氣，「吾人若不急起直追，將來勢必藉日文以考蒙古文獻，寧非學界之恥？」（陳垣 1931）。類似這種引爲恥辱的呼號，與上文所述傅斯年、陳寅恪和李濟的心聲是完全雷同的。

聘請陳垣，除陳寅恪外，劉復也是說客之一（17.12.14，傅致寅恪、半農函，「所檔」元字29號之7；18.1.23，劉復回傅函，「所檔」同上之9），但陳垣一直猶豫（18.1.28，劉復回傅函，「所檔」同上之8），終於沒來上任，只受聘爲特約研究員，把《敦煌劫餘錄》的書稿交給史語所出版。

史語所新學術的趨向還可以從對劉復與中山大學民俗學者的取捨，以及拒絕郭紹虞的決定中看出來。十七年肇建，設有民間文藝組（「所檔」元字198號之1），請劉復主持（「所檔」元字130號之4）。劉復雖然只長傅斯年四歲，但在北大教過傅，後來留學巴黎大學，獲博士學位。他對藝文研究的觀點在十四年(1925)寫的《敦煌掇瑣目錄》有清楚的宣示。他比較敦煌寫本《尚書》和幾首小唱的價值：



劉復致傅斯年書

> 照著向來沿襲的說法說，《尚書》當然比小唱重要到百倍以上，《尚書》當然是大的，小唱當是小的。但切實一研究，一個古本《尚書》至多只能幫助我們在經解上

> 得到一些小發明，幾首小唱卻也許能使我們在一時代的社會上、民俗上、文學上、語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見解（劉復1931，頁14）。

這就是一種新眼光，可以一掃過去的偏見，導引學者利用過去的材料研究當時的社會歷史文化，得出新看法，發現新天地，劉復謂之「舊瓶改裝新酒」。舊瓶新酒，亦即傅斯年「此雖舊域，其命維新」的意思，所以劉復「不希望成爲國學家」（同上，頁16），正如傅斯年之痛斥「國故」。按照劉復的規畫，史語所民間文藝組要做俗曲、俗樂、民歌、諺語，並望數年之內成一極可觀的「全國歌謠總藏」（「所檔」元字29號之6）。其用意固不限於這些民俗，而是如傅斯年對劉復說的「從此民間藝文若干基本問題得申端緒」（17.9.20，「所檔」元字130號之6a），往中國基層社會發掘問題，想與中山大學的《民俗叢刊》有所區別。

民間藝文研究容易流於「無聊」、「淺薄」，這是傅斯年與顧頡剛衝突的原因之一（《秘信》42冊，頁365），劉復則注意管制出版的品質，「按英國《詩學雜誌》(Chapbook)之例，每年出《民文彙刊》若干冊，登載自爲起訖稿子一種。」建立高水準的學刊才拿得出去與外人角勝，劉復與傅斯年開玩笑說：「兄本來不大贊成出無聊小雜誌，今改此法，想必欣然曰『正合孤意』，於是乎大點其頭，全身胖肉搜搜動！」（18.1.23，「所檔」元字29號之9）

劉復加入史語所五年有餘，因病去世，傅斯年「爲之流涕數次」，說他是「北大老教員中第一位不該死者」（23.7.23，《秘信》37冊，頁422）。因爲劉復是北大一位眞的走新學術的人，不做國學家，不是半吊子的「整理國故」者。相對的，稍後的郭紹虞便不了解史語所，民國二十五年他寫信給傅斯年，毛遂自薦，講了一大堆自己的研究成果，想進史語所（25.3.19，「所檔」元字34號之2）。郭的學問屬於傳統的文史考證和詩話，不是「預流」的學術，故傅老老實實告訴他「不在本所研究範圍之內」，給回絕了（25.3.22，「所檔」元字34號之3）。這也不能說是門戶，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個新學術團隊，只經過半年多的籌備，立刻成軍。傅斯年說這個所「無中生有」，並不誇張。他辦事的精神是先騎在虎背上，不退卻。傅斯年深切了解到新時代的學術「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於是提倡集衆的工作，「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他要同仁走出書齋，改變「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以上參引〈工作旨趣〉）。這樣的求知態度不僅創造一種新風氣，而且創造一種新人生觀，塑造一種新知識份子的形象。新材料激發新問題，因而援引新工具以謀解決；三者相互爲用，以期開創新的領域。這樣建構的「古代科學」其視幾年前他所籌思的「入門御路」遙然遠矣。

於是乎當民國十七年(1928)年底之時，傅斯年、陳寅恪、李濟和趙元任這批學術精英聚集在一起，含抱相同的學術使命，秉持相近的學術態度，在發掘新問題，找尋新材料，使用新工具的大方向上開步邁進，展開中國二十世紀的新學術旅程。這就是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來「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然而在人文學「新學術」的意義下，這類研究機構或大學似乎還不多見呢！

引用書目

一、檔案或基本資料

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簡稱「所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史資料初稿》(簡稱「所史資料稿」)，王懋勤編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藏本，1969。

3.《手稿本胡適的日記》(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1990)。

4.《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簡稱《秘信》)，耿雲志主編(合肥：黃山書社，1994)。

5.《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6.「傅斯年檔案」(簡稱「傅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7.《傅斯年全集》(簡稱《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8.《蔡元培文集》，高平叔主編，錦繡文化出版社，1995。

9.《羅家倫先生文存》，國史館，1976。

10.《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報告》第一冊(十七年度)，國立中央研究院文書處編輯。

二、近人論著

1.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1：5 (1919) 收入《毛子水全集・雜文》。

2.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

3.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爲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念的衝突〉，《新史學》8：2 (1997)。

4.朱家驊，〈悼亡友傅孟眞先生〉，《傅故校長哀輓錄》(國立臺灣大學，1951)。

5.余英時，〈陳寅恪史學三變〉，《中國文化》15、16 (1997)。

6.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現代評論》1：3 (1924)，收入《古史辨》第一冊下編。

7.李光謨，《李濟先生學行紀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10 (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

8.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1994)。

9.李　濟，〈傅孟眞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件重要工作的回顧〉，《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所長紀念特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收入《感舊錄》。

10.李　濟，《感舊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11.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研討會」(1995.12.17-18)；又《中國文化》12。

12.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文物季刊》1，(1998)。

13.胡　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二(台北：遠東書局，1919)。

14.胡　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季刊》創刊號(1923)，收入《胡適文存》第二集卷一。

15.胡　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讀書雜誌》18 (1924)，收入《古史辨》第一冊中編。

16.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17.夏　鼐，〈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3 (1979)。

18.陳　垣，〈中國史料的整理〉，《史學年報》1 (1929)。

19.陳　垣，〈日本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傳序〉，《師大史學叢刊》(北平：國立師範大學史學會，1931)。

20.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敦煌劫餘錄》，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 (1920)。

21.陳寅恪，〈陳述遼史補注序〉，《金明館叢稿》二編(1942)，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81)。

22.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 (1928a)。

23.傅斯年，〈所務記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 (1928b)。

24.董作賓，〈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上的貢獻——爲紀念創辦人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而作——〉，《大陸雜誌》2：1 (1951)。

25.劉　復，《敦煌掇瑣》，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 (1931)。

26.顧　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27.顧頡剛，〈民俗週刊發刊辭〉，《民俗》(1928)。

28.Wang Fan-shen, "Fu Ssu-nie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A dissertatio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also *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